

西南民族历史

研究集刊

4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

1983.11.昆明

目 录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纳目依人和拍木依人的考察报告·····	何耀华 1—41
试论贵州苗族的支系及其在文献上名称的演变·····	杨庭硕42—115
东周、西汉时期云南各族青铜铸造业在我国冶金史中 所占的地位·····	蔡 葵116—121
评“东山铜鼓”·····	李衍垣122—129
西瓯族源流问题的探讨·····	李延凌130—143
景颇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	汤芝兰144—150
金石文契中所见元、明、清初云南使用贝币考·····	方 慧151—166
有关东汉时期永昌郡户数、口数的几个问题·····	苏建灵167—169
略论南方少数民族原始性史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	李子贤170—178
越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或其残余·····	莫俊卿179—189
民族学·····	周庚鑫译190—212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纳木衣人和

拍木衣人的考察报告*

何 耀 华

前 言

1982年5月27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四川渡口市成立“六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并先期对雅砻江下游的民族进行试点考察。我被分配参加凉山分组，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刘辉强、伍呷、陈庆华和凉山州博物馆的龙西江等四同志，共同承担冕宁县里庄区联合公社藏族纳木衣人、拍木衣人的考察任务。我与龙西江同志先期至点，伍呷、陈庆华、刘辉强三同志因别的任务，在我们至点数天后陆续到达。

由于提前十余日先期返回单位，未能参加考察队的总结，亦未能看到本组其余四同志的考察记录，未能与他们共同分析访问中所得的全部资料，所以这份报告仅仅根据笔者极不深入、极不全面的考察记录整理而成。其中述及的许多问题可能是不准确的，所提出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现在提供出来，一是想作为今后的调查线索提供给日后的考察者，二是想把它送回纳木依，拍木依的干部群众中去检验，以使它的错误得到纠正，不足得到补充。

在整理过程中，除客观地类编访问纪录之外，还参考了手边极为有限的资料，以资对考察中碰到的问题提出初步的看法。这些资料是否使用得当，亦望得到研究和关心这个地区的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凉山分组的考察是在中共凉山州委、冕宁县委、里庄区委、联合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付主席穆文富同志（藏族）和凉山州财政局长王东才同志对这次考察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对冕宁藏族素有研究的冕宁县广播站的李云昆同志对我们给予了具体的帮助。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杨光甸同志在笔者整理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提供了他在泸宁地区深入调查的卓有成果。联合公社的藏族同志陆曙阿若（汉名李阿若，46岁，木耳大队瓦厂生产队）、汉牛马章（55岁，核桃大队）、蓝光泽（47岁，木耳大队）、蓝成国（34岁，核桃大队）、王建平（38岁，木耳大队）、王明芳（36岁，女，核桃大队）、吉文平（23岁，木耳大队）、李文珍（22岁，女，木耳大队）和汉族的袁登祥（34岁，木耳大队）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其中陆曙阿若，汉牛马章、蓝光泽、

* 本报告完稿后曾提交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作为雅砻江下游民族综合科学考察的初步成果付印，以征求冕宁藏族同志的意见，惟迄今未能印出，值此云南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之际，再作修改和补充，作为校庆献礼，提供校内师生作为内部参考。

蓝成国等同志是我们主要的访问对象。在完成这份材料的写作的时候，谨对上述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的谢意。

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对冕宁县多须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里庄区小学校长金万伦（藏族多须人，42岁）同志对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将他的父亲金元富（73岁）老人所讲家史、族史的录音磁带放给我们听，并为我们进行翻译。在此特向金万伦同志表示谢忱。

第一章 联合公社概况

联合公社位于雅砻江西岸川西南横断山脉锦屏山东部之侧坡，约当北纬28.2度、东经101.8度，雅砻江由北向南刻地而来。其东牦牛山高峰耸峙，江两岸悬崖峻峭，夹流对峙，由于极少冲积平地，沿江地带人烟稀少，许多地段仰而观之，仅见一线之天耳。

公社境内有四条自西向东注入雅砻江之大沟。南面之磨房沟及北面之大川毫沟水量较大。因流水由高山下行，侧坡被冲刷成若干大小之沟谷，形成分割之地形及山高、坡陡之地势。雅砻江河谷低地的海拔1200公尺。西面锦屏山之手爬梁子、北面石罐山、拉姑山海拔均在4400公尺以上。整个地区地形倾斜度为五十至七十度。

联合公社东界里庄和里庄区的纳窝公社，南接盐源县之民胜公社，西连泸宁区的健美公社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倮波公社，北靠泸宁区的南河公社。公社所属庄子、核桃、木耳、大川毫四个大队共计有十七个生产队，共四百六十二户、二千九百一十七人。其中藏族有416人，其余为汉族和彝族。较大的堡子（即村子）有锣锅底、瓦厂、木耳、核桃、大川毫、施家、边朴和阿日。藏族分布于海拔3500公尺左右的瓦厂、木耳、核桃三个堡子。这些堡子皆分布于山梁台地之上，堡子至堡子均需翻爬陡坡。

山川的险阻和历代反动阶级的压迫统治，使这个地区解放前不通车不通邮。境内道路均频踏所成，巨石深沟，一任自然，故无一不是羊肠曲径。境内有四条小路与境外相通，一是向南经民胜、西林、瓜别，行六日至盐源，据说此路不畅，须翻爬悬岩，故行人不众；二是向东，经松林坪渡雅砻江至里庄，再经木里、泽远至沙坝，或经纳窝、呷别（三合）至西昌，或从里庄北上经冉心沟、麦地、翻牦牛山而至冕宁，这是向外交通的一条主要路线；三是北经大川毫、木洛、南河、泸宁去九龙县，或去棉纱弯抵冕宁；四是向西经健美至木里藏族自治县之倮波。向东过雅砻江有两个渡口，一是麻哈渡，从松林坪下山可达；二是大川毫河渡，从大川堡子下山可达。均为木船摆渡，船工来自藏、彝、汉三族。由于行人不多，江水湍急，候一次船往往得花半天时间。谚语说：“难过不过麻哈渡，花钱不少花时多。”解放前摆渡一次之船费，约为现在的二至三角。藏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且以人背作为运输的主要支柱。境内至今没有形成专门之集市，解放前盐巴等生活必需品，靠马帮运出花椒、兽皮、药材，从盐源、沙坝、里庄、冕宁、泸宁等地换回来。

由于海拔高低不同，境内气候殊异，雅砻江谷底低地，海拔1500米左右之地带，气候比较温和，可种稻谷；随着海拔之升高，气温乃逐渐下降，公社所在之锣锅底附近，海拔在2600米左右之半山腰地带，年平均气温比较低，已不能种稻；核桃、木耳、瓦厂等海拔在3000至3500米左右之高山地带，气候寒冷，再往上为海拔在4000米以上之高原草场，那里的年平均气

温更低，不能种植庄稼，是牦牛的牧场。公社的年平均雨量约为700至1250公厘，分乾湿二季，湿季为六月至十月，其降雨量占全年的90%，其他七个月为乾季，降雨量仅占年雨量的10%。我们的考察，正值六月雨季，整个地区终日阴雨，雾气弥漫。

全公社有汉、彝、藏三种民族。各族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每一个民族都能操另外两个民族的话，如当地的俗语所说，“每一个舌头都会讲三种话。”

语言隔阂之消除，是以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为基础的，是历史上三族之间相互依存之结果。

雅砻江下游地区古时居住着邛、笮等许多部族、部落。秦始皇曾派“常頰略通五尺道”，在邛、笮地区“置吏”。《史记·马司相如传》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司马相如为西汉前期人，元光六年（前129）奉命往邛都等地招抚“西夷”，所言秦时曾在此区设郡置吏，当系事实，这说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冕宁、里庄地区就加入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王朝版图，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辖“县十五”，其中有台登县，为今之冕宁。而里庄、泸宁乃台登县属地。蜀汉、西晋仍置越嶲郡及台登县。南齐建“越嶲僚郡”。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开越嶲地于嶲城（今西昌）置严州”（见《元和郡县志·嶲州》），复置台登县。天和五年（570年）又以“大将军郑恪帅师平越嶲，置西宁川”（见《北周书·五帝纪》）。隋开皇十八年改西宁州为嶲州，台登县为嶲州所领。唐初亦置嶲州，领台登、越嶲、邛都、可泉、苏祁等六县。元明设罗罗斯宣慰司，今冕宁各地皆其所辖。明朝推行卫所制度，洪武二十七年于今冕宁置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清雍正六年罢卫改置冕宁县，属宁远府（治今西昌）。清朝统治者在设政治统治机构的同时，广置兵营，营下设汛、塘，层层派兵驻守。如设在雅砻江西岸的有泸宁营、庙顶汛、接兴汛、木罗汛、靖安塘、纳安塘、磋多塘、打约塘、近兴塘、普鲁塘、约噶塘、长资塘。

自秦汉以来历代治边，皆实行军民屯垦之政策。内地的汉族人民，大批地被移徙到边疆来，并不断融合到边疆少数民族中间去。不过，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对清代以前在雅砻江以西汉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已不可具体得知，但对清代置兵营塘汛以来汉族因不同原因而流入此区的情况，则是有材料可供考察的。西南民族学院杨光甸同志近期在泸宁考察，遍录该区碑刻，于新兴公社鸡窝的雅砻江岩岸上，发现当地汉族宗姓之三座祖坟，其中之一（宗兴照墓）有碑文如下（见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

皇清同治拾壹年拾贰月十一日 立

兴公生于江西省抚州府东兴县出东门离城卅里大地名小王藩十都上第五甲有周户上粮×湖宗洋湖村生长人民至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内出外贸易至湖北老河口转至四川建南道宁远府冕宁县出西门泸宁营接兴汛大鸡窝小地名新火山落业成家不料告终于此境而也

名 字

清登西逝须德上寿宗公 教 兴照老大人之墓

元

德玉

鳌

富

孝

孝孙登

榜孝曾孙 福贵

豹 荣
和玉 蛟 华
 高
 彝

据此墓志，宗兴照从江西落业鸡窝系在嘉庆十三年（1808）。这是现今发现的汉族移民在清代进入此区的一个最早的碑刻。从联合公社的情况来看，这里不但有汉族聚居的堡子，还有在当地形成势力的汉族官僚地主高姓。今公社治所，即高家的落院。至解放时高姓迁入已有五代，若以25年为一代计，其迁入的时间约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高姓迁来之后，曾受到黑彝奴隶主的多次袭击，如1949年，当地黑彝奴隶主安树清，联合木里和盐源的黑彝陈树清、安绍武家，集合五百余人的兵力来攻打高家，高家依靠当地汉族、藏族的联合力量，并动用泸宁设治局的兵力，战斗一个多月，将其打退。

为什么汉族能在雅砻江以西的藏族聚居区扎下根来呢？难道是像高家击退黑彝那样是靠武力征服的吗？不是，其首要原因是由于藏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汉族人民迁入这个偏僻的山区，给藏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藏族人民离不开他们。直到今天，情形仍然是这样。如在藏族聚居的木耳大队，有个汉族木工叫袁登祥，家有九人，从泸宁迁来已二十年，其中有两人会木工，一人会做篾活。袁登祥原准备到沙坝汉族地区上门（入赘），但当地的藏族、彝族群众不许走，正如他说：“他们不让我走，是需要我的手艺。我做木工二十年了，会盖房子和做各种现代的复杂的家具，而他们不会做。全公社只有我和和平村的王开全（汉族）能干木活，全公社藏族、彝族的复杂木活都是我们二人做。如果我去了沙坝，他们就恼火了。”其次，是因为这个地区藏族的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水平比较高，早已建立了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经济制度的特点是，只把生产者附着于土地之上，而使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领主）进行奴役的农奴，不是像黑彝奴隶主那样，非把你变为奴隶（娃子）不可。只要你缴纳地租，承担领主规定的封建劳役，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不是像大凉山的奴隶主那样，非对你进行强迫同化不可。联合公社以东至北迄大渡河一带的藏族（史称“西蕃”，宋朝时期就与汉族建立了封建性质的租佃关系。《宋会要辑稿》198册《蕃夷》五说：“淳熙七年（1180）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言，……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穆文富同志在介绍情况时说：“解放前汉族在我们藏族地区（指雅砻江以西之泸宁和锣锅底地区，都是藏族的佃户，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土地的，其所种之土地都是向藏族租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吃惊，宋人李嘉谋所言的情况，竟还如此完整地保留在雅砻江西岸的“西蕃”（藏族）社会中。据杨光甸同志调查，泸宁区的帕打堡子，有三户姓邱的汉族，从贵州迁入已八代，先后在古鲁沟、羊房沟、怕打堡子租藏族土地耕种，都是藏族的佃户。又与洛居堡子相隔一条小沟的滥柴弯大队，系汉族聚居的大队，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胡正美说，胡家祖籍湖广麻城孝感青石板，迁来已有六代，在滥柴弯住的汉族最早的是胡家和赵家，后来又迁来杨家，全都是租藏族的地种，先是租尼玛卡两兄弟的，后是租麦里火扎的（见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这种租佃关系，无疑是宋代以来藏（西蕃）汉之间的租佃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试想，如果不是藏族（西蕃）本身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汉藏（西蕃）之间能建立租佃关系吗？若无这种租佃关系，汉族人民要在那里扎下根来，那是不堪设想的。联合公社

与泸宁地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差别，这两个地区的藏族都是亲戚、家门关系。故上述资料完全可以说明联合公社藏汉族之间的历史关系。

联合公社的彝族，大部与藏族杂居。如在藏族聚居的核桃大队，就有31户彝族（共104人）杂居，其中3户是黑彝，皆姓安。彝族称藏族为“俄租”，意为土地之主人，他们认为“俄租”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居民，自己是后来才迁来的。联合公社的藏族普遍有关于孟获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曾跟随孟获作战。有的甚至认为孟获不是彝族的头人，而是藏族的领袖。这说明藏、彝之间有密切而悠久的历史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藏、彝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巨大的，如除二者都会操对方的语言外，两族男子平常所穿的服装没有么什差异，相互的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区别出他们中谁是彝族，谁是藏族。

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藏族的封建领主制度和彝族的奴隶制度。藏、彝、汉人民相互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个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麻哈渡口，横空架起了铁索桥，滚滚东流的磨房沟，建起了现代化的水电站，陡峻的牦牛山和咆哮的雅砻江东岸有汽车在行驶，大客车每天从县城始发，驶过麻哈渡铁索桥而在下午抵电厂。不通车不通邮的状况，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藏族的堡子中，高音喇叭声不时传诵着来自北京的声音；雪亮的电灯照亮了每户纳木依人的客堂，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给藏族带来幸福，纳木依姑娘的麻达咪歌声，诵扬着藏族人民誓为现代化建设而斗争的心愿。

第二章 历 史

一、纳木依、拍木依与川西南之藏族

联合公社的藏族，包括两个不同的支系，一个自称纳木依；另一个自称拍木依（普米）。

木耳大队、核桃大队的拍木依蓝光泽、杨正明说：“听老人讲，过去纳木依和拍木依不仅不开亲，而且还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因为拍木依认为纳木依不是真正的藏族。拍木依认为自己有藏王传给“通杆”、有藏文经典、有庙顶的喇嘛寺（这个寺为和爱公社的拍木依伍家所建）、有自己的语言，只有拍木依才是起祖于尼玛拉萨脚的藏族。据老人说，纳木依也有“通杆”和藏文经典，但都是拍木依传给，纳木依的和尚“帕比”虽然也进庙顶的喇嘛寺，但不是像拍木依的和尚“阿什”那样是去那里学经，而只是去朝拜。”

拍木依语、纳木依语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其差别如下表：

汉语名称	纳木依语名称	拍木依语名称
酒	乌	俄
吃	架子	克则
狗	吃	齿
小孩	腊克	约

纳木依认为，拍木依和自己是两兄弟。瓦厂大队的纳木依李阿若说，他的祖上从尼码拉萨脚迁来已有四十八代，第十二代普普时分为两房，长房繁衍为拍木依，次房繁衍为纳木依。纳木依不同意过去那种认为纳木依不是藏族的说法。下面是李阿若家四十八代人的谱系：

作戛——木依——作移——木移——撮日——立俄——牙戛——木赫——纳赫——格移——尼移——普普——俄赫——枯里——卡西——帕子——洛左——吉米——勿始——拉勒——腊子——苏土——尼码楚——沪古——立米——哈萨——呷及他——勿煞——呷若——甲若——和布——石尔比——固咱——呷拉皮——胡扎皮——格可查——罗堵——阿呷——娃移——尔果——阿呷——格可——热尔果——尼码乍——尼码——阿若（即陆睹阿若）——萨皮。

由于纳木依和拍木依之间的亲密关系，拍木依目前已不再强调他们与纳木依的差别，而且同意纳木依、拍木依是两兄弟及纳木依的起祖也在尼码拉萨脚的说法。木耳大队的拍木依阿什汉牛马章说：“纳木依和拍木依一样，人死后都要把他的灵魂送回尼码拉萨去，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尼码拉萨脚迁来的。根据藏文经典有关送魂路线的记载，拍木依、纳木依从拉萨迁徙来现今住地是走的下述路线：

尼码拉萨脚——布木尼阿支左——都都惹丕脚（雪山草地）——素木那拉格——牙拉阿角石——石拉和脚日——拍也纳脚日——阿耶和脚日——尼麻谷谷日——日皮那卡日——培耶赫河脚——拉麻复戛——拉麻服忙——其补哈衣——尼不哈衣——拉麻谷若——依赫服满——依里复戛——里拉鲁左泽日——哈施的里维戛——约呷黑硕果——措巴楚日——觉米丢不洛——尼日吉八——拉沙甲米主——谷亡兹若鲁——卡斋日古——石突拉沙斧——拉沙米甫日——拉沙好古白——拉沙惹打白——呷乌卡——吉米尔赫——拉沙赫左白——拉萨基古白——那兹木索合——牙子兹古北——拉苦尼此日——拉苦交俄——拉左复瞞——洛戛日古——都都日古——多卡列只日——多卡日古北——恩坑多卡服——素波拉藏——阿莎苦移戛——阿沙苦衣洛——阿支若左日——纳纳日——阿沙皮洛波——八查丢不洛——里米勒北——阿渣凡堵扶（联合公社核桃堡子）、纳卡阿黑扶（联合公社木耳堡子）、卡哑牙戳扶（联合公社瓦厂）。”按：这些地方，背诵者和当地藏族群众都无法一一以它同今天的汉语地名相对照，他们只知是从西藏的拉萨迁来的，经甘孜州的拉巴拉惹分路至九龙及今所在地。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这个公社的拍木依、纳木依虽然有蓝光泽、杨正明所说的 那些差异，但共同性多于差异性，而且二者已经融合为一了。他们已共操同种语言，而且互相开亲，同信喇嘛教、同崇藏文经典、同供“通杆”、同尊白石。换言之，他们不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都认为自己是藏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我们认为他们共同构成了藏族的一个独立的支系（下文简称其为川西南藏族）。

如果从这个藏族支系的整体而言，川西南藏族约二万余人，包括纳木依、多须（见附）、里汝、尔苏、鲁苏、木尼保、须米、拍木依等八种自称，分布在汉源、石棉、甘洛、越西、喜德、盐源、冕宁、木里、西昌、九龙等县，也就是今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下游（包括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这个地区与西藏地区一样，分布着自西北地区南下的后来形成为我国藏族主体的许多古羌人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獯戎。（豪羌）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

支河曲西数千里（按：指今西藏地区），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汉晋时代，同属于髦牛（即牦牛或旄牛）种的不同部落，在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流域形成牦牛、摩沙等各具特征的一些族体。拍木依为牦牛夷（髦牛羌）之后，纳木依则是摩沙夷之裔。二者之间的差别，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川西南藏族八个不同自称的人，大部分亦为牦牛夷之后，如分布在汉源、甘洛、越西的“尔苏”，分布在石棉的“鲁苏”、分布在冕宁县坝区和东北部的“多须”、分布在九龙、冕宁、木里诸县之“里汝”等，都源出于牦牛夷。其语言和“拍木依”的语言皆与羌语接近，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曾就“多须”进行考察。据说，冕宁的“多须”是从米尔苏达（三道金河）、白尔拔谷（蚂蚁子山）、扯马峨亚（寡妇岩）迁来的。“多须”的祖先是一个妇女，她因掬了一颗雪弹子吃受孕而生了鲁沽。鲁沽生了三个儿子：长名鲁沽梭雨、次名麻达乌雨、三名鸟儿枯雨。这三个儿子分衍出十家人。其中鲁沽梭雨是冕宁金家和罗家的祖先；麻达乌雨是姜家和李家的祖先；鸟儿枯雨是姚家和魏家的祖先。金家又称鲁沽阿呷家。鲁沽阿呷生了七个儿子，其中之一叫沙玛也查，又一个叫鲁沽吉乌。鲁沽吉乌是马家的始祖。清朝时，金家、李家皆被封为土百户、姜家被封为土千户。于同宗于鲁沽，姜、马、李、金、魏、姚等家是不能相互开亲的，只能与韩、木、穆、由黄等家开亲。说冕宁“多须”各姓的祖先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妇女及后来的一位男性祖先鲁沽，反映了“多须”母系社会及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这段历史当发生在其从上述三个地方迁来川西南之前。“多须”把自己的起源与雪联在一起，说明其祖先应是从西方或北方来。冕宁城关伍宿村伍家自言是“西天起祖、戛耳落业”。並说西天指西藏一带，戛耳指今阿坝一带；相传泸宁新兴公社的穆家祖上是“多须”，因被封在拍木依的地方作土官，而变成了“拍木依”，他家是“西天起祖，章登落业”，据说章登在冕宁附近。这就是说，多须是从西方（西藏）迁到阿坝，再迁到冕宁来的，或不经阿坝，而经甘孜的九龙等地直接迁到冕宁来。这与古羌人迁往西藏及川西南的记载是符合的，说明川西南藏族与西藏的藏族同源。

二、拍木依史略

拍木依（普米）系牦牛羌后裔之一。早在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牦牛羌所居之地区置“旄牛县”（见《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云：“通望县有故牦牛城”，阳山县、台登县郡旄牛故县地。”按：通望县、阳山县地皆在今之汉源，台登县在今冕宁。由是可知，旄牛夷早在西汉时就聚居在今冕宁至汉源的广大地区。冕宁县之旄牛山、古时西昌经冕宁、汉源而达成都之古旄牛道，皆因其地为旄牛夷聚居而得名。

汉晋时期，旄牛夷曾多次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延光二年（123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后汉书·安帝纪》作灵关，地在今喜德），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由于旄牛夷的势力比较强大，东汉王朝的镇压虽然一时得手，但始终没有把它的反抗平息下去。在牦牛夷的反抗之下，旄牛道绝道曾达百余年之久，直至三国时期才为张嶷所开。《三国志·张嶷传》说：“（越嶲）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

…巖遣左右賫货币赐路（指旄牛夷酋狼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巖，巖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响毗王，遣使将路朝贡。”

唐宋时期，在旄牛夷分布之大渡河以南及雅砻江、安宁河地带，出现了由旄牛夷发展而来的勿邓、两林、丰琶等“东蛮”部落。《新唐书·南蛮传》载：“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间。……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又有栗蛮二姓，雷蛮二姓，梦蛮二姓，散处梨、嵩、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十低三姓、阿屯三姓、弓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根据樊绰《云南志》卷一所记这个区域的途程，可考东蛮诸部之具体分布。《樊志》说：“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嵩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县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台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谓之北谷，天宝以前，嵩州柳强镇也。自入吐蕃更增修险，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谷东南一百三十里至罗山城，天宝以后吐蕃新筑，非国家旧城……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间，皆乌蛮也……束、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冲。”按：黎州即今汉源，邛部川即邛部旧县，地在今越西县，距黎州三百五十里，为勿邓之邛部六姓所居。《樊志》所谓“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语，与自黎州“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相悖，其“邛部”显系黎州之误。《读史方輿纪要》卷74有“勿邓在邛部之旁”语，说明勿邓大鬼主梦冲之辖地，在越西之附近。由邛部行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读史方輿纪要》卷72云：“沪沽关，在司（建昌卫）东北百里，有沪沽巡司，或曰即故台登县。”由是知台登为今沪沽。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册）台登县条说：“今沪沽属冕宁县，汉之台登当包有今冕宁县地，然县治应在沪沽。汉以来由大渡河与邛部之交通，取道今之越嵩县，而不经冕宁城。台登县治为交通要站，不应在冕宁城也。”此说甚是，向达《蛮书校注》卷一所论台登为今冕宁城之说不可从。据此，初止（《新唐书》作初裹）五姓，即居于越嵩与沪沽之间。保塞城（北谷）在台登北去八十里，当为今冕宁城是也，束、钦两姓蛮在此。概而言之，勿邓所属二十姓，分布于今越西至冕宁之地区。“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指从越西向南七十里为两林部落，据今之里程，两林应在今喜德。丰琶在两林南二百里之建昌城山上，当在今西昌县境内。

根据以上所考，勿邓、两林、丰琶等东蛮诸部，正居于故牦牛县地或故牦牛道区域，亦即元、明、清时期“西番”的主要住地、今川西南藏族之分布区。从地理分布上可知，东蛮诸部不应是彝族先民而是“西番”（藏族）的先民。

成问题的是，这一说法并不为民族史学界多数学者所公认。为说明拍木依的历史，对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再作如下的说明：首先，在宋以来的文献上，东蛮诸部被称为“蕃”。《宋史·蛮夷传》说：“凡风琶、两林、邛部，皆谓之东蛮，其余小蛮各分隶焉。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落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又《宋会要辑稿·蕃夷》说：“黎州边面，近则有曰邛部川、曰河南蛮、曰女儿城蛮、曰青羌、曰吐蕃、曰五部落……州之三边，大抵诸蕃环列。”史书上夷（彝）蕃有严格之界限，多不混称，如《资治通鉴》卷250说：“（咸通八年二月）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恃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胡注云：“六姓蛮：一曰黎蛮，二曰夷蛮，三曰訛蛮，四曰狼蛮，五曰勿邓，六曰白蛮。”（亦见《新唐书·南蛮传》下）其所谓夷蛮，指的就是今天的彝族，胡注把夷蛮与勿邓分成

二类，说明二者不是同一族系。故不能认为东蛮诸部是彝族先民；其二，东蛮诸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高，如第一章所述，远在宋朝时期他们就与汉族发生了租佃关系，向租种其地之汉人收取“蕃租”，而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乃是当时凉山彝族的生产发展水平所达不到的。直到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还停留在奴隶制发展阶段，凉山的边缘地区虽然已有某种租佃关系的存在，但其发展水平是很低的，根本未出现“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的情况。如果把东蛮诸部视为彝族，那是讲不通的。而这样的租佃关系，还一如既往地存在于民主改革前的“两番”和汉族之间；其三，东蛮诸部以邛部为首，结成强大联盟，屡与南诏、吐蕃、唐朝争战，且能左右唐、诏、蕃三大势力的争夺。唐王朝屡调他们攻击吐蕃。《新唐书·南蛮传》说：“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数兵出攻吐蕃。”又说：“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遣韦皋书，乞兵攻吐蕃，皋遣将进逼台登……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于北谷（今冕宁）”。由于此诸部势力强大，其首领屡受宋朝封号，如宋封两林、丰琶首领为将军，有怀化、归化、归德、归义的称号；封邛部首领为“大将军”、“新都王”（见《续通鉴长编》卷88），对比历代王朝加封黑彝土司土目，或不受封，或封而不固，内部一片家支争夺的情况，说此诸部为彝族亦是说不通的；其四，文献有勿邓诸部被彝族强迫赶走的记载。《元史·地理志·邛部州》说：“（州）在路东北，大渡河之南，越嵩之东北，至宋，岁贡多马土物，封酋为邛都王。今其地夷称为邛部川，治乌弄城，昔磨些蛮居之，后仲由蒙之裔（指彝族）夺其地。”此所谓“磨些蛮，当是对勿邓诸部之误称。即便不是误称，这条材料也至少说明，原来居于邛部的勿邓部不是仲由蒙之裔，而是与此有别的另一族系。故勿邓等部不是彝族。

元、明、清时期，今拍木依等川西南藏族被称为“西番”（亦作西蕃）。考“西番”一词，始见于《宋史·蛮夷传四》：“淳化元年（990），诺驱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诏增给其直，诺驱令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川中市”，此所谓“西蕃”当指环列于黎州三方之旄牛夷后裔，即川西南藏族之先民。“西番”在元、明、清时期的地理分布，仍以故旄牛县地为主要。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四宁番卫（驻今冕宁县）说：元时于邛都之野立府曰苏州，借苏示之义以名之也。国初言土官怕兀它从伊噜特穆尔为乱，于是废为卫，降官为指挥，环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在建昌北九十里，东连越嵩界，北至西天乌思藏（即西藏），西邻三渡月落口……。”换句话说，就是从文宁北至汉源及甘孜州境，东至越西、皆有西番分布。明朝在今甘孜州天全设天全六番招讨司，就是因为那一带有西番人。冕宁的西番人自来数量多，势力强大，与之杂居的彝族和摩梭族，大都在西番土千户、土百户的统治之下。为了说明以上情况，下面特将《冕宁县志》卷十《土职》所载十四户西番土官的材料录出：

一酥州土千户姜文富，其祖姜喳，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管西番寨落四处：额即、我瓦、瓦杯、勒了。

一架州土百户李正龙，其祖里五，管西番寨落六处：架州、九卜、三代、擦拉、椀格、小打。

一糯白瓦土百户李正隆，其祖纽咩，管西番寨落四处：糯白瓦、温州瓦、大格打、买五。

一苗出土百户罗成兴，其祖热即巴，管西番寨落五处：苗出、枯别、窝使扒、火炭堡、小格打。

一大村土百户马朝元，其祖也四噶，管西番寨落五处：大村堡、即瓦、擦拉堡、哑巴堡。

一大盐井土百户叶廷耀，其祖前布汪噓，管西番寨落五处：大盐井、姐糯姑、勒扒、拖乌、糯巴堡。

一热即瓦土百户金得禄，其祖牙卓撒，管西番寨落五处：热即瓦、扯羊、览金堡、打骂乌、曹姑。

一中村土百户马兴贵，其祖歪即噶，管西番寨落五处：中村堡、阿溪桥、约角、小盐井、伍宿堡。

一三大枝土百户印玉龙，其祖甲噶，管西番寨落四处：么别堡、结果罗、麻祖冲、呷斯。

一现护窝卜土百户土妇伍朱氏应袭土百户伍洪贵，其祖蓝布甲噶，管獾狻寨落四处：窝卜堡、中间堡、蜡烛堡、几斯堡。

一河西土百户杨世福，其祖那姑，管猓狻寨落四处：纳拉白、葛家堡、濫坝、山脚下。

一虚郎土百户沈应龙，其祖济布，管猓狻寨落十一处：老鸦沟、阿甲堡、列别堡、赶羊沟、元麻沟、大堡子、白宿凹、波罗沟、瓜园、新隆沟、落翁。

一白路土百户申有福，其祖倪姑，管猓狻寨落五处：鹅巴堡、大湾子、洗租、马五甲、五里碑。

一阿得桥土百户杨世显，其祖募庚、管猓狻寨落四处：响河坝、小白姑、大石头、擦耳岩。

拍木依是西番众多支系中的一个主要支系。宋元之际，其中一部分向南流徙进入滇西北地区，发展为今天云南兰坪、丽江、维西、永胜、宁蒗等县之普米族。普米是其自称拍木依的同音异写字。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云：“西番，本滇西北徼外夷，流入永北、丽江二府、居深山，聚族而居，地种荞麦，纳粮。”元世祖征大理路过西番地区时，其中一部分随元军流入云南，如清人余庆远《维西闻见录》载：“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名。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指维西），随从中流之至此者。……浪沧江内有之，与么些杂居，亦么些头目治之。”据文献记载，西蕃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比较先进的部分，宋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经营农业并收取“蕃租”；比较落后的部分，仍以游牧为主业。《蜀中广记》引《土夷考》说，宁蕃卫的西蕃：“刀耕火种，迁徙无常，不以积藏为事。”流入云南的西番，其中一部分亦如此。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永宁府（今宁蒗）说：“所辖四长官司多西番。佩刀披毡，无室屋，夏则山颠，冬则平野以居，而畜多牛马，有草则往，无草则移，初无定所。又有所谓野西番者，则长往而不可制。”天启《滇志》卷三十载：“西番，永宁、北胜、蒗蕨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尚勇力，善射，和酥酪于茶……随畜迁徙。”又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图说》：“野西番，垂发，衣氍毹，不常厥君。种麦川食，养牛多生牦，其俗不同于西番，永北厅有之。”

总而言之，拍木依源于秦汉时代之牦牛羌；唐宋时期为勿邓、两林、丰琶诸部众多自称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为西番的一个主要的支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川西南的拍木依及被称为西番的其他自称的人由于接受西藏的喇嘛教及藏文藏经等西藏藏族的文化，使之具有了藏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形成藏族的一支。迁入云南地区的拍木依，虽然也信喇嘛教，“有缅字经（即藏文经典），以叶书之”（见《天败滇志》卷三十），但由于迁出后受藏族的影响不像川西南的那样大，所以在云南发展成了单一民族——普米族。

三、纳木依史略

纳木依源出于汉晋时代之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筰县说：“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按：泸水为雅砻江，定筰县即今盐源、盐边县地，为摩沙夷所居。这是有关摩沙夷的最早的记载。

唐宋时，摩沙夷称“磨些”，其分布地一是在大渡河以南的地区，与川西南藏族先民拍木依、多须、里汝等杂居。樊绰《云南志》卷一说：“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廻三曲。每曲中间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负阻深险，承上莫能攻讨。泸水从曲罗南经剑山之西，又南至会同川。边水左右，总谓之西蛮。”《新唐书·南蛮传》说：“剑山当吐蕃大路，属石门、柳强三镇，置戍守捉，以招付使领五部落：一曰弥羌、二曰铄羌、三曰胡丛，其余东钦、磨些也。”雅砻江源于青海南部，东南流经石渠、德格、甘孜、新龙、雅江诸县，至洼里转向北流，至泸宁区的和爱公社北部之新火山又折头向南直下形成N型，所谓“萦廻三曲”之地，正在我们这次考察的泸宁、里庄地区。“每曲中皆有磨些部落”，说明这个地区有磨些部落所居。柳强镇即今之冕宁，弥羌、铄羌、胡丛、东钦，为旄牛羌（即川西南藏族）之不同支系，后来的“西番”之先民。这说明至迟之唐代开始，磨些在冕宁就与西番杂居在一起。其次是在滇西北地区。樊绰《云南志》卷四说：“磨蛮（磨些）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又卷六说：“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並磨些种落所居之地。”按铁桥在今丽江市西北之塔城，大婆、小婆、三探览皆在今丽江市境，昆池（昆明）即盐源，说明今丽江地区迟至唐代就为磨些蛮之住地。

在元、明以后的历史文献中，磨些又写作“么些”、“么麽”、“摩梭”或带有侮辱性的“獯豸”。《冕宁县志·土职》载，清末时冕宁尚“有瓦都等处土目四名，俱是獯豸苗裔”，其姓氏及所管辖之地名如下：

一瓦都土目安普氏，应袭土目安锡龄，其祖安承裔，管獯豸寨落五处：瓦都营、坝显堡、和尚堡、凹古脚、夏拉。

一木木凹土目鄯成贵，其祖那咱，管西番，（一云獯豸）寨落五处：木木凹，落西山，约乐口、那架瓦、木拉罗。

一耳挖沟土目安朝恩，其祖达安，管獯豸寨落五处：耳挖沟、黑箐沟、纳窝堡、长脚堡、绵纱湾。

一瓦尾土目安成元，其祖卢沽，管獯豸寨落五处：瓦尾堡、白宿瓦、水墨岩、赶到底、麦地沟。

这四家“獯豸”土目管辖之民族，除瓦都土目管辖彝族之外，其余三家所管皆“摩梭”或西番。根据我们这次之实地考察，纳窝堡为今里庄区的纳窝公社所在地，绵纱湾即棉纱湾、麦地沟即今麦地公社所在地，赶到底即今之坎到底，这些地名皆在雅砻江之东岸，为“摩梭”及“西番”所居。雅砻江西岸为七儿堡土目辖区。《冕宁县志·土职》说该土目“穆怀玉，其祖穆别系西番人。于雍正五年从征三渡水蹊踏路径有功赏给世为土目，管獯豸寨落九处：七儿堡、庙顶堡、纳安堡、木罗堡、皮罗堡、钱闾楼、接兴堡、糯居堡、扒挞堡。”按：庙顶堡、接兴堡、木罗堡今仍袭用此名。糯居堡为今之洛居堡、扒挞堡为今之帕打堡，皆在泸

宁区。这些堡子为“獯狻”所居，与唐樊绰《云南志》“萦廻三曲，每曲中皆有磨些部落”的记载相合。联合公社地区亦“萦廻三曲”之地，与泸宁区山水相连，声息相通，两个地区的居民有不可分割的密切的联系。当时居于今联合公社地区者，无疑亦是“獯狻”。

应当指出，大渡河以南至冕宁的地区，自古为西番区域，但迟至唐代就有磨些与之杂居，《冕宁县志》所谓“西番寨落”或“獯狻寨落”，都不会是指青一色的“西番”或青一色之“獯狻”的寨落，正如《冕宁县志·土职》所云：凡土官“所管堡寨，不必尽是一种。如獯狻部落，西番为多，举此可见。”据《冕宁县志》所载，西番和么些的心理素质和风俗大体一致：“么麽、西番二种，均赋性醇良，衣梭布，左衽辫髻。”又西番“男子纽发成髻”，么些“男子纽发成索”；西番“兵刃不离身……种青稞圆根为食，以酥煎菜为羹……，么些“出入常带刀，种荞麦及青稞食之……饮食以青稞荞麵牛羊酥乳煎茶食之。（按：园根，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称为蔓青，么些亦以为食。元人李京《云南志略》云：“末些蛮，……地凉，多羊、马及麝香……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园根，已半实粮也”）在社会发展和好尚方面，《冕宁县志》说：“獯狻略与西番同，旧称其性刚朴，其俗鄙野力田负苦，罕入城市，近日西番、獯狻多有似汉民者，置田放债，非自道不知为夷也。”由于同受藏族的影响，二者都信喇嘛教。《冕宁县志·夷俗》说：“西番多习喇嘛经，进藏为喇嘛。”么些的情况亦是这样。以上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冕宁地区的么些，即纳木依，迟至清代就与西番融合为一了，或者说变成为西番的一个支系。属于冕宁以南至滇东北地区的么些，虽不少亦与西番（普米）杂居，习俗及信仰亦与西番大体相同，但由于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域，即以今丽江形成为聚居中心，所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而形成今天的纳西族。

由于纳木依是融合于西番的么些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发现纳木依与么些人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纳木日（又称蒙族、居于盐源、木里等县）为纳西族的一支。联合公社瓦厂大队的纳木依李阿若说，纳木日是在他家第九代纳赫时分房出去的。直到现在，纳木依和纳木日还有特殊的关系。解放初期，他的叔伯哥哥李长寿还去盐源县俄底区联合公社的纳木日人中去上门。82年1月，他带着二十多名纳木依青年去那里走亲戚。当地纳木日的话，他有30%听得懂，经与当地长者对家谱，也发现其中大都相符。

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联合公社的纳木依源于摩沙和唐宋时代“萦廻三曲”中的磨些及元、明、清时代这个地区的“獯狻”。由于自唐宋以来与当地的拍木依（西番）杂居，乃逐渐融合于拍木依中去，所以他们已与同源于摩沙、磨些的纳西族不同，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川西南藏族（西番）的一个支系。

四、“西番”与西藏藏族的历史关系

在我们这次考察中，拍木依、纳木依都说自己起祖于西藏的尼玛拉萨脚（即拉萨），而且他们都能背诵自己从今拉萨迁出时所走的路线，他们的人死后都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回尼玛拉萨脚去。既然如上文所说拍木依源于秦汉时代的鹿牛羌，而纳木依源于汉晋时代的摩沙夷，那何以会说他们都是来自尼玛拉萨脚呢？我们在考察中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访问，但都无什么结果。我们仅仅发现：他们滔滔不绝所背诵的迁徙路线，大部分地名均不能和今天的地

名相对照；他们所乐道的传说，多亦不能自圆其说，如说纳木依和拍木依是两兄弟，但又说二者的语言过去不能相通，姓氏各不相同（据说纳木依人的姓氏不同于拍木依的，而与纳木日的相同）。这些矛盾说明拍木依、纳木依源出于鹿牛羌及摩沙夷之论证是不能推翻的。但我们也不可把这个论证去否定民间广为流传的纳木依、拍木纳是两兄弟，都起祖于尼玛拉萨脚的传说，因传说不可全信，但亦不可全不信。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应该从拍木纳、纳木依与藏族的历史关系中去考察，也就是从他们共融于藏族的历史关系中去考察。

据文献记载，西藏的吐蕃势力强大时，曾统治大渡河至冕宁的地区长达三十年之久（自至德二年始至贞元三年止）。《册府元龟》卷965说：“（东蛮鬼主）骠傍等自陷嵩州，城于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据《旧唐书·南诏传》记载：“会安禄山反，阁罗凤（南诏王）乘釁攻陷嵩州及合同军。”《考异》解释说：“唐历是年吐蕃陷嵩州，《新传》是岁阁罗凤乘釁取嵩州会同军云云，盖二国兵共陷嵩州也。”《通鉴》记此事发生在至德元年（756年）。《新唐书·地理志》说：“嵩州越嵩中都督府，至德二载没于吐蕃。”这与《通鉴》所记相差一年。盖，南诏与吐蕃至德元年攻陷嵩州后，並未能站稳脚跟，唐于次年复置越嵩郡，南诏与吐蕃再战，才于至德二年占据嵩州。这在《南诏德化碑》中有较详的记述：“赞普钟五年（即天宝十五载，七月改至德元载）范阳节度安禄山窃据河、洛，开元帝出居江、剑，赞普差御史赞郎罗于惹结贽赦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嵩、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诏恭承上命，即遣大军将洪光乘、杜罗盛、殷附克、赵附于望、罗迁、王迁、罗奉、清平官赵佺邓等，统细于蕃，从昆明路，及宰相倚祥叶乐、节度尚检赞同伐越嵩。诏亲帅太子蕃围逼会同，越嵩固拒被僂会同请降无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六年（即至德二年，757年）汉复置越嵩，以杨廷璠为都督，兼固台登。赞普使来曰：汉今更置越嵩，作爱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慈蔓。既举奉明旨，乃遣长男凤伽异驻军泸水，权事制宜，今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入。越嵩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擄。于是杨兵邛部，而汉将大奔。”《新唐书·南蛮传》言，勿邓、两林、丰琶诸部”天宝中皆受封爵（按：受封时间当在天宝十二载），及南诏陷嵩州，遂羁属吐蕃。”南诏、吐蕃共陷嵩州后，各据南北。南诏于今会理设置会川都督府，统辖彝族占居主要的嵩州南部地区，吐蕃则占领泸沽以北东蛮（西番）为主的北部地区。

吐蕃占据及其败走后的数年中，东蛮（西番）地区战争连绵不断：

大历十四年（779）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侵，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有神策都将李晟、金吾大将军曲环，合东川山南兵，击破吐蕃、南诏兵，克维、茂二州，追击于大渡河外，大败吐蕃、南诏（载《新唐书·本纪》、《通鉴》、《旧唐书·崔宁传》）。

贞元四年（788）十月，吐蕃侵嵩川，攻两林、骠旁、东蛮及清溪关、铜山、韦皋与东蛮连兵败于清溪关外。十一月，吐蕃后入侵，又为西川所败。（《通鉴》、《新唐书·本纪》）。

贞元五年（789），东蛮断泸水桥攻吐蕃，请皋济师。皋请精卒二千，与蛮共破吐蕃于台登，杀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腊城酋悉多杨朱及论东柴等，虏坠死崖谷不可计，多获牛马铠装。遮遮，尚结赞之子，虏贵将悍雄者也，既败，酋长百余行哭随之。悍将已亡，则屯栅以次降定。（《新唐书·韦皋传》）

贞元十一年（795）正月，西川拔吐蕃罗山城，置兵固守，邛南驿路遂通。（樊绰《云南

志》)罗山与上述所破之保寨、大定、俱属东蛮地区之重镇。

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吐蕃侵嵩州,刺史曹高仕败之于台登城下。(《通鉴》)

贞元十五年(799),吐蕃引众五万自囊贡川分击南诏和嵩州,无功而还(《新唐书·南蛮传》、《通鉴》)。囊贡川,即樊绰《云南志》卷一所言之西望川,亦即西贡川,地在今冕宁县境内。

频繁战争,对东蛮地区的社会经济破坏很大,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东蛮(西番)与藏族的融合。吐蕃在战争中取胜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东蛮中推行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失败时则有大批的吐蕃士卒流落下来。因此,就以上战争的客观效果而言,不管吐蕃胜利还是失败,都促进了吐蕃与东蛮的融合。当时吐蕃统治东蛮地区,其措施之一是置城驻兵,如樊绰《云南志》卷一说:“(北蕃)自入吐蕃,更增修峻,因城下有路,向囊恭地(当即囊贡川)。谷东南一百三十里至罗山城,天宝以后吐蕃新筑,非国家旧城。”其所筑之城不但在军事有作用,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也起作用。经过大约三十年的统治,吐蕃将自己的文化传播于东蛮之中,使之接受藏文经典和西藏的喇嘛教。由于唐宋时期逐步接受西藏的文化,所以到元明清时,西蕃已与西藏的藏族具有了共同的心理素质,以致形成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因此之故,明朝时期的文献,把西番和吐蕃视为一体,连吐蕃也统称之为西番。

综上所述,西番自唐以后与西藏藏族的关系极为密切,至元、明、清时融合于藏族之中,成为藏族的一个独立的支系。尽管西番的支系复杂,各支语言及生活习俗与今天西藏的藏族或川西的藏族有差异,但他们接受了藏族的文化,并具有与藏族同样的民族心理素质,因此,他们应是我国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拍木依、纳木依说他们起祖于拉萨,来自尼玛拉萨脚,这除了说明他们与西藏的藏族具有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之外,也可能还说明联合公社的拍木依和纳木依,其中一部分就是唐时来自西藏而散落于当地的吐蕃士卒之后裔。

第三章 经 济

一、农 业

联合公社藏族的经济生活是半农半牧,农业和牧业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农作物主要有包谷、洋芋、甜荞、苦荞、燕麦、青稞、黄豆、四季豆、元根等,其中包谷、洋芋是主要的。所有作物都种在陡峻的坡地里。

包谷农历三月下种,八、九月收获。种时犁二次,五寸深,采用点播,中间薅锄二次。过去施农家肥,现在施化肥。平均亩产250斤。其播种面积约合耕地面积的60%。

洋芋是农历一月下种,六月收获,种时犁二次,中间薅一次,施农家肥,亩产折成粮食为三百斤,灾年150斤。播种面积约合耕地面积的40%。

苦荞、燕麦、青稞、元根种在海拔很高的轮歇地中。轮歇地多选草长得深、土质厚,有枝叶复盖而又比较平缓的山地开成,种时将灌木荆棘和草砍倒,晒干后放火烧,而后垦殖,撒下种子。当年开,当年种,不施肥。苦荞亩产300斤,但种一年后须丢荒五、六年至十几年才能再种。遇土质比较好的施肥后可年年种。

甜荞、元根多是在收洋芋后种在洋芋地里,元根生长期短,农历六、七月种下,九、

十月就可收。

黄豆、四季豆、南瓜等是套种在包谷地里，每户每年约可收得黄豆四、五十至一百斤。

农业生产工具有犁头、挖锄、钉耙、薅锄、弯刀等。犁头多数人家都有，用以耕翻坡地，为纳木依铁匠所倒，规格是每个一尺一、二寸长，七寸宽。解放前本族铁匠不会制作，须由木里、冕宁等地购回，而且是几家人共同买一个轮流使用，无力购买者一般是请有犁头者为之代耕，再以换工去进行补偿。解放后本族铁匠掌握了倒铧技术，都已使用当地自制的铧口。挖锄长一尺一、二寸，宽二至五寸，用以挖山地、开荒地，为当地的汉族铁匠打制。解放前由于向外地购买生铁困难，因得之不易而被视为传家宝。薅锄五寸长，六、七寸宽，用以中耕包谷、洋芋、荞子。钉耙与汉族地区的相似，用以挖粪肥。弯刀连木柄约长八寸，宽三、四寸，用以砍山，是过去刀耕火种的主要工具之一。

加工粮食的主要工具是石磨。均为汉族石工帮助打成，直径有一尺至一尺余的，须二人操用；小者直径不过尺，一人即可操用，燕麦、青稞、包谷、荞子皆以石磨磨成粉或小颗粒来食用。磨槽是木制的。

当地兽类，如野猪、豹子、狼、野牛、熊、鹿子、毫猪、獐子、猴子、山鼠、松鼠，对包谷、洋芋、荞子、豆类的危害极大。对付的方法，一是进行猎捕，合村青壮年一起出动，使用弯弯枪，以火绳点火击发。二是夜间派人去田中守卫，不停地吹牦牛角，使之不敢来侵犯。除此之外，害虫对农业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其中尤以土蚕对包谷的危害突出，过去无农药，一般仅以木炭灰撒在根部，但效果不大。

由于铁质工具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耕作粗放和施肥不足，再加之兽、虫的危害，解放前这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不足，群众一年有三、四个月需采集山油菜（生长于海拔 37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拌青稞面蒸吃）等野菜充饥。

解放后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刀耕火种，轮歇地多，农作物以种荞、燕麦、青稞为主；解放后改变了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轮歇地减少而熟地增多，农作物改而以种包谷、洋芋为主；解放前仅施少量的农家肥，包谷平均亩产才一百斤，解放后改用化肥，包谷亩产三百斤左右；解放前铁质工具数量不足、质量差，现在犁头、锄等铁质工具已经不缺，而且有了钢磨、脱粒机等现代化的生产辅助工具。农业生产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潜力还很大。随着这个地区“四化”建设的发展，反映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落后性将被克服。

二、畜牧业

藏族地处高山，既有海拔四千米以上优良的高山牧场可放养牦牛；又有水草丰茂的半山、矮山草坡可放养黄牛、骡、马、绵羊、山羊等牲畜。

牦牛的经济价值极高，一条牦牛一年可产酥油15—25市斤。其毛可纺线织裙子及做当地藏族人民喜穿的“不苏呷扎”（牦牛毛织的领褂）。其肉是藏族人民最喜爱的食品，皮可卖给国家作为皮革工业的原料。牦牛还可作为高山的运输工具。因此，几乎每家每户都养有牦牛，在联合公社藏族饲养的四大牲畜（牦牛、黄牛、骡、马）中，牦牛的比重占40%。据说历史上牦牛山、罐罐山、石官山、大荡山都是牦牛遍野的牧场。由于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彝族奴隶主阶级的窃掠、本民族祭祀鬼神中的滥宰滥杀及无法战胜的瘟疫使其数量日愈减少。由于采用原始的饲养方法，过去瘟疫流行时唯一的办法是请和尚来驱鬼唸咒，结果导